

德国史

史蒂文·奥茨门特 著 邢来顺 肖先明 常县宾 徐继承 刘馗 译

A New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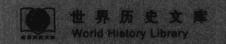


A New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定价: 48.00元



德国史

The German People



图字:01-2009-5513

A New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by Steven Ozment
Copyright © 2004 by Steven Ozmen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China Publishing Grou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史/奥茨门特著;邢来顺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000-8237-8 (世界历史文库)

I. 德··· Ⅱ. ①奥··· ②邢··· Ⅲ. 德国 - 历史 Ⅳ. K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6946 号

责任编辑 陈 光 王亦妮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5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30 千字

印 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引言 寻找优秀的德国人

近期德裔美国人举行了一次社区聚会,一位首次造访美国的德国人与我同席。我问这位同桌对美国印象如何,得到的答复是: "与别的国家相比,美国人民更有教养且不善言辞。"令人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有做出让人满意的回应,数分钟后我才想起来: 当今的美国人中,有5800万人有全部或部分的德国血统。^①

几个世纪以来,不管是外国人还是德国人自己都认为,德国人致力于自我约束和良好的秩序,拥有完美的技术技巧,并且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引以为自豪,不过,他们的这种执著、技巧和自豪却近乎固执、苛求和令人吃惊的傲慢。当然,这些话也可以用来形容其他的国家和人民。对德国人而言,这样的说法只是一个复杂而令人困惑的民族各种奇闻轶事的某种表现而已。这个国家的事业一直在发展着,但她从一开始就在欧洲历史中扮演着中心角色。尽管很少有人认为德国人挽救了西方文明,然而,无论是这个文明受到不同寻常的危害,抑或获得非凡的成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像德国人这样持久地居于

① 大约 1 830 万人宣称具有德意志血统。"You Told Us: Ancestry": www.census.gov/population/socdemo/ancestry/German.txt。

这一文明的中心位置上。德国人是欧洲各民族中最难理解的群体,没有这样一个民族,人们就无法清晰地讲述欧洲的文明历史。尽管现代史学常常对德国的描述只有寥寥数笔,但作为具有特殊和普遍意义的历史,有关德国的故事却充斥于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布莱希特和格拉斯的作品中。

在战后的多数时间里,在涉及到德国问题的讨论时,通常以 1933 年希特勒和纳粹的掌权为开始,也以之为结束。新生代的历史学家们在其论著中利用更大的结构力量(工业化、经济和国内政治)来代替伟大人物的作用,讲述时间更长和更为复杂的德国历史。与这种史学的转变相对应,新生代的德国政治领袖们决心将他们的国家带入与欧洲及世界诸强合作的国家行列。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后果是,出现了一个为人期望的行为正常的德国。

尽管德国的发展方向令人颇为乐观,但是事实证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遗产是无法动摇的,人们仍然囿于对这笔遗产的迷茫、痛苦和困惑之中,不能前行。因此,德国历史的内容大体上仍是以纳粹和犹太人为主。甚至时至今日,人们在考察德国的历史时,仍然围绕着纳粹这样一个吸引人的话题,这种状况不仅让普通大众沉迷不悟,也让期待前行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感到迷惘。这种持续的景象已经将20世纪以前的德国历史变成了寻找纳粹主义先驱,探寻民主未能替代绝对领土国家原因的猎场。

因此,甚至在德国国内都存在着一种流行看法,人们似乎相信:如果深刻地挖掘,揭开历史的表象,那么德国人一直是隐藏的法西斯主义者。^①专业的历史学家和媒体之所以塑造这样虚假的印象,首要的原因是继续将普鲁士成为强权帝国和第三帝国失败之间两个世纪的历史视为整个德国的历史,其次是人们从1933年纳粹掌权这一事件倒过来解读德国历史。在美国,"历史频道"就以"希特勒频道"而著称,其节目主题通常是元首和第三帝国,许多美国人不假思索地就把

① See below, chap. II.

纳粹等同于德国人。在历史人物的传记中,阿道夫・希特勒的传记在 最畅销的出版物中仍有很大的比重。

今天的德国研究已经处于两种相互矛盾的方法交叉的十字路口,两者都是寻找那些能将德国带回到 20 世纪以前的先导和先例。^① 第一个办法较为古老,其使用也正在减弱,它是从德国历史中寻找延伸到第三帝国时期的阴暗面,发现德国历史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是异常的。另一个办法是从德国历史中寻找 1949 年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前兆,指出过去和现在的德国都有众多这样的前辈和迹象。在老一辈中,不论是学者还是学界之外的人,都曾经更坚定地从过去的久远历史中求助相关的线索。然而,上述两种方法都对现代社会之前的德国久远历史缺乏深厚的兴趣。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讽刺从遥远古代的背景来考察德国历史的努力,将之称为"塔西佗假设"。^② 所谓的"塔西佗假设",意为一种被引入歧途的信念,即一个了解德国部分历史的人就认为了解了整个德国历史。这可追溯到第一位日耳曼历史的研究者古罗马的科纳里乌斯·塔西佗(55—120)。

一、历史学家

在试图解读德国成为民族社会主义的积聚之地时,历史学家们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它们相互碰撞而又相互补充。他们都是实证主义者,相信事实,认为事实意味着不言而喻。他们的这种做法却伤害了那些移民派历史学家,这类历史学家只能用我们可以理解的少得可怜的笔墨来描述德国的过去。最近,两代自由主义左派社会历史学家被归并到史学阵营内,他们分别是老一代的德国历史学家(所谓的批判历史学家)和年轻一代的英裔美国历史学家,他们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老一代的历史学家将自己的角色理解为医生和文物工作者,不仅致力于重建过去而且致力于揭露和切除目前坏死的肌体。他们在

① Cf. Richard J. Evans, In Hitler's Shadow: West 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ttempt to Escape From the Nazi Past (New York, 1989), pp. 11-40, esp. 114-15.

² The phrase is Rolf Dahrendorf's. See chap. I.

书写近现代德国历史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道德要求,而作为对这种要求的反应,历史学家的目标就是要解放和借鉴。

在寻找罪魁祸首时,通常的最大嫌疑犯就是 19 世纪普鲁士主宰下的德意志帝国,它带有沙文主义、军国主义,敌视自由民主、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① 用戈登· A. 克雷格的话说,在追溯过去的历史学家们看来,政治上碎片化的德意志帝国从一开始就逐步演变为"服从的乐土"。② 这种看法认为,德国的中心地区很久以前就分裂为多个征战不休的领地国家,其民众相继受到天主教、新教和虔诚派等教派的神职人员所宣扬的尊崇统治者的教育,因此直到 18 世纪末期也未接受社会契约和主权在民的启蒙思想。这样一来,面临危机时滑向强人统治就是德国的第二个特征了。在分裂与驯服中,德意志国家统一和政治民主的机会就不是或早或晚的事儿了。

在与美法两国的革命政治作比较时,想象中的德国政治和社会的落后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20 世纪后半期批判历史学家的著作认为,在19 世纪,德国工业、经济和社会方面所取得进步的高大形象无法与其保守的政治社会组织相容。1830—1880 年的德国到处都是铁路、汽灯城市、报纸和大学;无论在历史、哲学领域还是在语言学和法律的研究领域,最新的世界领军人物都在德国。德国人甚至在医学、生理学、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860—1879年间,德国科学家有70 项新的医学发现,而世界其他国家总共也只有

① Georg G. Igger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Middletown, Conn., 1975), pp. 93—94, 96—98; Jan-Werner Müller, Another Country (New Haven, 2000), chap. I; Isabel V. Hull, The Entourage of Kaiser Wilhelm II, 1888—1918 (Cambridge, 1982), pp. 1—3. Leonard Krieger, "German History in the Grand Manner" (review of Gordon A. Craig, James J. Sheehan, Fritz Stern, and Hans-Ulrich Wehle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4 (1979): pp. 1007—1017. Wehler's three-volume, 2300-page narrative: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 Vom Feudalismus des Alten Reiches bis zur defensiven Modernisierung der Reform ära 1700—1815; 2: Von der Reform ära bis zur industriellen und politischn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1815—1845/1849 (Munich, 1987); 3: Von der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1914 (Munich, 1995). Subsequent volumes carry the story forward to 1949.

² Gordon A. Craig, The Germans (New York, 1982), p. 22.

55 项而已。^①

然而,与此同时,德国向美国、南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来的移民却日益增多。1850—1870年间,即德意志政治反动和国内民主运动失败后的半个世纪,出于对政府的社会歧视和宗教迫害的不断增长的恐惧,有170万德意志人移居到了美国。^②一份在德国流行的美国指南曾描绘说,在新移民所到达的这一国度里,个人天赋和能力比与生俱来的特权更为重要,这里既没有诸侯,也没有他们所谓"王权神授"的腐败宫廷。^③

批判历史学家们谴责德国政治的退化,并将之归因于中等阶级的软弱无能。这些前途光明的市民们不但未能用新的民主制度来消除顽固的容克、官僚和军官,反而日益屈从于他们的统治,新的德国未能打破旧制度的桎梏。有看法认为,在从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进程中,中产阶级将对民主的热情转移到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上。于是乎,他们也加入了传统精英之中,破坏了德国按照美国、英国或法国的模式发展的民主道路。根据这种诠释,德国过去很长时期内迈向政治现代化的最初步伐,是由更具有启蒙性的法国从外部施加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若非18世纪末19世纪初拿破仑和法国人占领德国的莱茵兰,德国仍将处于政治上四分五裂、等级森严的中世纪社会。④

① David Blackbour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 of Germany, 1780—1918 (Oxford, 1998), p. 275.

② Edward R. Brandt et al, Germanic Genealogy; A Guide to Worldwide Sources and Migration Patterns (St. Paul, 1995), pp. 137—171; John A. Hawgood, The Tragedy of German-America; The Germans in the U.S.A.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New York, 1940), pp. 57—58. See also Mack Walker, Germany and the Emigration, 1816—1885 (Cambridge, Mass., 1964), and Anne Galicich, The German Americans (New York, 1996), pp. 13—17.

⁽³⁾ F. W. Bogen, The German in America (Boston. 1851), pp. 39-41, 57.

⁽⁴⁾ Richard J. Evans "Whatever Became Of the Sonderweg?" inRereading German History: From Unification to Reunification, 1800—1996 (London, 1997), pp. 12—14; Krieger, "German History in the Grand Manner"; James Van Horn Melton, review of Wehler's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1—2,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5 (1990): 189—190.

1. 优秀的公民

近来,历史学家们日渐摒弃了对德国历史所进行的这种乏味和笼统性的判断。他们指出,19世纪德国公民社会的启蒙和进步是持续不断发展的。对德国中产阶级的轻率批评尤其受到质疑。在一系列严谨和翔实的研究中,一个更加复杂和进步的德国社会浮出水面,德国中产阶级比老一代历史学家所宣称的更为成功,这反映了德国与欧洲其他进步国家的相互呼应。虽然中等阶级的革命并不突出,影响力也不大,但它毕竟在德国发生过,并详尽阐述了各种个人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工作权、结社权、言论权、保护权和博爱权,还有法制。①在公务员、企业家和政治领袖们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与旧德国并立的新德国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尽管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革命具有局限性,并遭到镇压,但它与当代的欧洲民主很相似。它的成功表明,通向民族社会主义之路并非直接和不可避免的,同样也表明,倘若遇到德国受到的聚集起来的诸种危机的打击,其他欧洲国家取得的更大进步也未必能使它们避免后来在德国所发生的事。②最起码讲,这种对 19 世纪的德国更有同情心的解读表明,它并非如其他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是确定无疑的"纳粹的前室",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③

还有一种类似的看法也成了这种修正传统看法的牺牲品。这种类似的看法根据德国位于欧洲中部这样一种地理位置来推论德国走上特

① Eley defends, "a less abject bourgeois role in modern German history"; Blackbourn cites advances in "property rights and ideas of competition, the rule of law, the Emergence of philanthropy" as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amounting to a programme…which created … a new king of public man". David Blackbourn and Geoff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Oxford, 1984), pp. 13, 164

② Harold James, A Germany Identity, 1770—1990 (New York, 1989), p. 212, See below, chap. II.

③ 参见"持续的辩论", in James F. Harris, ed., German-American Interrelations: Heritage an Challenge (Tübingen, 1985), pp. 55—94; James J. Sheehan, ed.,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1976); Richard J. Evans ed.,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London, 1978)。

殊的极权主义道路。德国地处中欧的位置使其至少在两条战线上无法 防卫(奥地利被从组成德意志帝国的诸邦中排挤出去后,德国就有3 条战线无法防卫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地理位置对德国而言既 是良好的栖息之地,也是个陷阱;既易侵略他国,也易被别人侵略。 由于这种地理位置对猎捕者和牺牲者都有利,因此,从德国历史的复 杂性而言,无论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辩解史学,还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扩张主义的批判史学,都是不公正的。①

2. 变色的历史

将更为复杂的德国从二战后阴郁的道德化史学中挽救出来,也是后来的德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尼佩代的任务,这是一位批判历史学家的伟大批判家。他作为改革派历史学家开始了职业生涯,既具有前瞻性优势,又具备了前辈的长处。他也相信可靠的历史必须如撰写编年史那样从过去写到现在,而非如战后历史学所喜欢的那样从现在写到过去。知道一个故事的结尾,然后在这一故事结局的驱使下去了解整个故事是一回事,而从一开始来讲这个故事就是另一回事了。尼佩代

① 比较 Charles S. Maier, "German War, German Peace", in Mary Fulbrook, ed., Germany Since 1800 (London, 1997), pp. 539—555; 比较 Evans, In Hitler's Shadow, pp. 104—107. 在铺平通向 1933 年的道路过程中,并非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历史学家所相信的那样,19 世纪的大公司和资本主义已经被证明彼此串通一气。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参见: Henry A. Turner, Jr., 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 (New York, 1985); Jeffrey Diefendorf, Businessmen and Politics in the Rhineland (Princeton, 1980); Rolf Dahrendorf,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London, 1968)。事实证明,处于俾斯麦和威廉一世统治之下的帝国政府也并非如历史学家们所宣称的那样,是早期的盲目排外的纳粹主义者。对现实外交政策和殖民扩张竞争的担忧,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以及对叛乱充满恐惧,这些因素在德意志帝国的政策决策中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有关富于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所强调的国内政治局势("权力的结构","社会阶层的畸形")以及帝国政府和民族社会主义者所奉行的外交政策连贯性的研究,请参阅 Fritz Fischer 的两本著作: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üsseldorf, 1961; English ed., 1967)以及Krieg der Illusionen (Düsseldorf, 1969; English ed., 1975)。参见 Hull, Kaiser Wilhelm II, p. 1。

在多卷本德国史的首行就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写道: "拿破仑是开启者。" 德国近现代史以 1805—1806 年法国大败奥地利和普鲁士、占领德意志的莱茵兰为开端,而不是以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开始,因为它几乎无法给德国历史提供线索。如果将 1933 年作为德国近现代史的首页,那么很可能最后一句话也在这一页上了。

然而,没有人怀疑过去给现在投下的浓烈的阴影,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这种阴影尤其强烈。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精英们到陆军元帅、魏玛共和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这条线是直接明了的,从威廉二世时期的沙文主义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党派主义这条线也是如此。然而,自中世纪以来,德国人之中就存在着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和归化的德意志人的恐惧,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和归化的德意志人宁愿与王权联盟而置祖国于不顾。19 世纪和 20 世纪,忠于罗马的天主教徒、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都成功地超越了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成了近现代的象征。

尽管尼佩代欣赏 19 世纪的革新,但他并不认为在德国近现代史存在连续性综合症,也即德国现代史不是一种渐进性的基因疾病。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有些"新的东西",它们既不能完全复原,也无法从中完整地找到它们之前的那些源体。从宗教改革时代的反专制运动到 19 世纪昙花一现的民主运动,德国的历史已经懂得不断改变政治组织形式。1919 年欧洲存在 25 个民主国家,到 1938 年已经倒下了 14 个。显而易见的是,德国不是唯一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蹒跚犹豫

① Evans, "Nipperdey's Nineteenth Century", inRereading German History, pp. 23—43. Nipperdey's volumes: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 (Munich, 1983 [English, 1996]);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I: 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 (Munich, 1990);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II: Machtstaat vor der Demokratie (Munich, 1992).

的国家。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界的这些批判的巨大教训具有两面性。 从现在追溯过去来解读历史,这是理解历史而非借鉴历史。同样,人 们对历史的信念也变形了,那就是,历史可以被解读成黑的,也可能 被说成白的。正如尼佩代所描绘的那样:历史"具有相似性,模棱两 可,并且充满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现实并不是一切事情都已经统筹 安排好了的体系,除了那些'连续性前景'的选择对象外,每向前一 步都充满矛盾冲突。这些冲突并非整齐划一地归入进步与反进步或者 民主与反民主的范畴之中"。②

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数十年中,德国处于正常状态。尽管如此,正如对德国人所有事物的争论一样,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也出现了两极化。就尼佩代的批评来说,他不是消除黑色传说的白色骑士,而是位辩护士。他致力于粉饰美化近一个世纪的德国法西斯主义,以便说明统一的德国期望消除德国历史的痛苦因素。对于尼佩代,评论家理查德·J. 埃文斯认为,紧迫的问题在于,德国历史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能否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责任 "开脱"掉。③ 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尼佩代承认德意志帝国和民族社会主义的连续性,然而却拒绝承认它们是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豌豆。④ 尼佩代相信历史的色彩是一种灰色、混杂和矛盾的阴影,当他去消除阴影时,

Nipperdey, "1933 und die Kontiuität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inNachdenken üb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Essays (Munich, 1987), pp. 186—205, esp. 168; Thomas A. Brady, Jr., Turning Swiss: Cities and Empire, 1450—1550 (Cambrideg, 1985), chap. 7; Peter Blickle, Gemeindereformation: Die Menschen des 16. Jahrhunderts auf dem Weg zum Heil (Munich, 1985).

② Nipperdey, "1933", p. 200.

③ Evans, "Nipperdey's Nineteenth Century", pp. 28—31. 埃文斯认为尼佩代在德国的"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中还不算声名狼藉之人。在埃文斯的史学回顾中,他对尼佩代的探讨篇幅远多于对自由主义者 Ernst Nolte 的关注(两者篇幅大致是 20 页对 2 页)。后者在 20世纪 80 年代后期曾试图将纳粹主义的罪行一般化,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激烈争吵。埃文斯给予尼佩代这般的关注,证明其自身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Beyond the Historikerstreit", in Rereading German History, pp. 221—222; see below, chap. 12, n. 84. On the so-called Historikerstreit, cf. Charles S. Maier, The Unmasterable Past (Cambridge, Mass., 1989)。

Evans, "Nipperdey's Nineteenth Century", pp. 35, 41.

9 他却不愿意将阴影等同于实质。最终,在这种逻辑之下,德意志帝国、 魏玛共和国、民族社会主义、第三帝国和当今的联邦共和国都必须为 自己辩护,任何一个都无法证明另一个有罪或为另一个开脱罪责。

埃文斯是英国人,他站在了批判历史学家们的一边。相较于那些试图洗刷掉德国历史污点的人,他更宽恕那些用纳粹的画笔抹黑了很大部分德国历史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真实的但不成比例的善恶。但是这种信念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遇到极端的挑战。按照尼佩代的逻辑,好像这数十年与其他年代一样,也处于道德混乱的状态,严格地讲,相关研究也表明就是如此。然而,许多人无法忘怀和宽恕那个年代的各种恐怖,认为这样的信念是有问题的,甚至是一种亵渎。

目前,许多人相信,从20世纪30年代的状况来解读德国历史的这种方法是有缺陷的,而且也是过时的。人们正以一种更客观、更富有同情心的立场来重构德国历史。① 诚然,随着新的一代又一代德国人的出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悲剧距德国人越来越远了。同其他国家一样,德国是德国人世世代代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因此,在那段黑暗岁月后出生的德国人不会再允许他们的生活为那种黑暗岁月所控制。指责尼佩代粉饰纳粹主义,会推动尼佩代进一步努力进行探讨。这是一种提醒:任何染指这一领域的人都会面对道德的挑战。②

二、政治家

1949 年成立的东德和西德都有理由将 1933 年作为德国历史的中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都尽可能紧密地与反纳粹的抵抗运动站在一起,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在民主德国,共产党就声称它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天生敌人",有权利

① Thus Evans on Wehler, "After Reunification", in ibid., p. 238.

② 有关这一棘手的问题,其他现代德国历史学家也有论述。比较: Tim Mason, "Intention and Explanation: A Current Controversy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m", in Mason, Nazism, Fasc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Cambridge, 1995), pp. 212—230。

继承"最优秀德国人的遗产"。联邦德国也有殉道者的鲜血要展示,这种鲜血既证明了其合法性,也提醒了那些很少将纳粹与德国人加以区分的征服者,那就是,在整个希特勒统治时期,一直存在一个另外的德国。^①

由于盟国自己的政治经历以及对德国人期望值很低,可以理解的是,他们认为德国人集体犯罪的这种最初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也并非完全不对。联邦德国为自己的道德依据申诉说,最醒目的德国抵抗运动是施陶芬贝格在1944 年谋刺希特勒。②谋杀的幕后者并不是自由民主派人士。他们不信仰自由民主,也不信民族社会主义。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即使在魏玛共和国这样一个民主时代,他们也幸存了下来。他们是一些沉湎于保罗·冯·兴登堡传统之中的人。兴登堡是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如果没有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他的政府也能形成多数联合的话,他在1932 年就会让希特勒黯然消失。③施陶芬贝格等密谋者与兴登堡一样憎恨希特勒,也憎恨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使希特勒掌权和保持权力的民粹主义民主。如果他们的密谋获得成功的话,他们的新政府也不会出现丘吉尔或罗斯福式的人物,如果不使德国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边界和盟国承认德国在欧洲的绝对主权,他们的新政府也不会同意和平。④

然而,在德国过去两个世纪所走过的道路方面,德国政府的官方看法并不强调这一点。与忙于追溯过去的历史学家一样,在向前看的投票民众的委托下,德国政府必须讲述自己的德国历史。它有责任将德国民众带向充满希望的未来,而不是将他们丢弃于徘徊不前、无法掌握的历史之中。德国政府要讲述的是光明而非阴影。

德国在世界各地的使馆都有德国政府每年出版的《德国概况》

① Ian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London, 2000), pp. 185—187

② 施陶芬贝格将炸弹安放在希特勒的脚下。

③ 参见第十章。

⁴ Kershaw, Nazi Dictatorship, pp. 188-189.

(以下简称《概况》)。这本书对政治挑战进行了简洁表达。《概况》除通过对各邦(在德文中,"邦"一词的复数叫做 Länder,单数为为 Land)进行逐个介绍来说明今天德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外,也概括了官方对 2000 年德意志历史的看法。① 在最近版本的《概况》中,德国历史从公元1世纪谢鲁斯克人的首领阿尔米纽斯即德国人众所周知的赫尔曼讲起,他率日耳曼军团于公元9年单独打败了3个罗马军团。《概况》以严肃讨论德国统一的代价为结束。

1999 年纪念版的《概况》认为,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对于重新统一的德国而言,回顾德国的历史,有 9 个特殊的年代,而《概况》在涉及历史时的主旨,是审慎地从中摘选了 3 个特殊年代。第一个年代是 1848—1849 年法兰克福议会,尽管它宣布德国公民享有民主自由,人人平等,但却没有落到实处。第二个年代是建立魏玛共和国的 1919 年,它继承了法兰克福议会未竟的事业,首次给妇女以选举权,并在德国国会中保留了仍然不甚相配的 41 个席位。② 然而,希特勒通过魏玛共和国颁布的非常法而攫取了权力,魏玛共和国随之寿终正寝。最后一个年代是 1949 年,标志是自由的国会批准了新的宪法——基本法,其中包含了防范极权统治再度发生的安全机制。③

为了进一步认识姗姗来迟的民主胜利,《概况》在这些德国民主的里程碑中又加上了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和1990 年两德的重新统一。它对德国历史采取了长时段的观察视角,指出民主的迹象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那时,全欧洲性的会议在德国城市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召开,以讨论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国际和约。④

在政治家看来,9个历史年代证明了优秀德国的顽强历史。德国

① Facts About Germany: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50 Years On (Frankfurt-am Main, 1999), pp. 90-137.

② Hagen Schulze, Germany: A New History, trans. D. L. Schneider (Cambridge, Mass, 1998), p. 202.

③ 一方面禁止总统剥夺个人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确保政府权力的有序交接,确保德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Facts, pp. iv - xxiii。

⁴ Ibide, pp. v, xxiv-viii.

在经历了无数的挑战后生存了下来,最终变成了现代的自由民主国家。 与许多历史学家一样,政治家也相信,他们的国家曾经行进于一条特殊的历史道路之上——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艰苦战役。 打败并抛弃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德国真正的政治命运是 1949 年成立的联邦德国,而非 1933 年的纳粹德国。丑陋的德国人不再陷入以期望为开始、以危害为结束的历史循环之中,至少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优秀的德国人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使德国的统一和民主之火薪火相传。

1. 塔西佗的质疑

当今的德国是一个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也是自由福利国家的典范。 自古以来,德国就一直是国际商业和贸易的先锋(这是地理位置给予 的恩赐之一),近来,它又掌握了不友善的并购的艺术。^① 德国显示了 承担大国责任的意愿,参加了西方大国在波斯尼亚和阿富汗的维和行 动。与此同时,它作为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正常的国家,却在英美两 国在伊拉克的行动问题上畏缩不前。

然而,过去的历史仍纠缠着德国。在德国历史的最初岁月里,罗马人曾长期将"蛮族"的标签贴在日耳曼部落的身上。这些日耳曼人是可与罗马人相媲美的武士,甚至更为优秀。他们也是未来的后罗马时代欧洲文明的新领导者。时至今日,德国人仍必须应付那些名声很臭的标签,它们会使得全世界不断回想起近代德国不同的野蛮行径。在这种野蛮主义的行为之下,不论是最具有同情心的盟国还是其他外国,都无法提供安全保障。与早前的历史相比,有不少外国人对德国人批评更加善意。德国人可能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作为一个民族受到了抑制,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与所有已经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民族一样,统一后的德国也必须面 对本国的历史。由于德国曾经在西欧历史上交替扮演过最成功与最具 威胁的角色,因此当德国人自我思量时,整个世界都屏住呼吸予以关

① 参见第十二章。

注也就可以理解了。当德国总理表示,要像欧洲其他大国那样不带感情地指导国家事务的意向时,许多人都感到战栗。这可能是古老的德国文化准备回归铁血斗士岁月所发出的隆隆声响吗?在这样的时刻,可以让人宽慰地记住的一点是:德国历史是在交替变化中前行的,并非只是稳定地在一个方向上流淌;而且德国历史上的文明和创造的纪录要比非人道和破坏的纪录更长。

新的社会历史学家协会至少更易接受德国近现代历史的部分内容,它给长期倾向于揭发丑恶和指责的战后史学带来了些许平衡。从这个方面讲,这些历史学家与当代的德国政府有共同之处。德国政府也决心推动德国这样一个曾经举足轻重的现代国家继续前进,德国也有权利保持这样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如果有理由为更充分和更公正地讲述德国历史而感到高兴的话,那么也有理由为继续将德国的未来置于恐惧和想象力之中的那种战后幻觉感到悲哀。一方面,德国仍然是那个近现代史上充满着侵略和极权主义的记录的永久顺从的国度;另一方面,诚如贡特·格拉斯所描述的那样,德国是一个屈从的、有悔意的国家,是一个理想化的平等主义民主国家,它敞开大门吸纳一切。① 所有这些抉择都摆布着可怜的德国人民,在失败的状态下,他们要么摆脱对统治者的温驯和恐惧,要么陷入乌托邦式的舍己为人之中。这简直不大可能就是这些 20 世纪的现代幸存者的前景。

在德国历史的多数时期,德国人拥护的理想是没有极权主义的秩序和权威,他们的追求是没有自由、民主的自由与平等。德国人与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社会政治模式的差异并不在于拒绝个人自由,支持专制的或极权主义的统治。②历史的经验让德国人害怕混乱甚于害怕暴政,如果为了得到良好的秩序而要限制自己时,他们倾向于约束自己。他们一直小心谨慎地通过一种强制性的信仰保持着这一点,这种信仰并非自由,而是纪律。而这一点也保持了人民的自由。

① Ibid.

② 比较, Blackbourn and Eley, Peculiarities , pp. 55-59。

对德国人而言,魏玛共和国和民族社会主义是 20 世纪的新经历,并不是历史上为人所熟知的生活方式。德国第一个民主政府仅仅维持了 1919—1933 年间的 14 年时间,民主政府失败后出现的第一个极权政府也只维持了 1933—1945 年的 12 年时间。历史学家们看到了前者与 1848—1849 年革命的相同发展方向,后者则与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具有同样的特征。然而,现代德国最显著的特征仍然是其历史经历中民主体制与极权主义的独特性。

所有这些都会使人产生疑问。超过 2 000 年的悠久文明能用过去的 150 年加以定性吗? 谁是 1848 年和 1933 年之前的德国人? 贯穿着这些意义重大却截然不同的事件的悠久德国历史,能有助于今天对这些事件的理解吗? 本书接受了"塔西佗的质疑",试图通过尽可能久远地找到相关的合理信息来考察和阐释德国人所构成的历史。无论今天人们对德国人怎么评价,他们似乎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仍使敌人和自己幸存了下来。他们的所作所为已载人漫长的历史的记忆中。

引言: 寻找优秀的德国人 / 1

- 一、历史学家 / 3
- 二、政治家 / 10

第一编 从早期部落到第一帝国

第一章 错综复杂的蛮族:古代罗马人 与日耳曼人的关系 / 2

- 一、罗马化的日耳曼人 / 3
- 二、蛮族化的罗马 / 8
- 三、如日中天的日耳曼人 / 13

第二章 从墨洛温王朝到霍亨斯陶芬王朝:中世纪 日耳曼人的统治 / 20

- 一、墨洛温王朝 / 21
- 二、加洛林诸王 / 24
- 三、从法兰克帝国到德意志诸邦 / 33
- 四、皇权的回光返照:霍亨斯陶芬王朝 / 40

第二编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

第三章 人与神: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 / 48

- 一、首位新教选帝侯 / 52
- 二、新神学体系 / 66
- 三、新的市民社会 / 71
- 四、宗教改革和犹太人 / 79
- 五、现代批判视野中的宗教改革 / 86

第四章 饱经蹂躏的欧洲大地: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德国 / 94

- 一、战争起因 / 94
- 二、战争的爆发 / 98
- 三、丹麦人 / 100
- 四、瑞典人 / 102
- 五、最后的战斗 / 104
- 六、和平降临 / 106

第五章 帝国之敌:专制主义与普鲁士的崛起 / 110

- 一、勃兰登堡—普鲁士 / 112
- 二、虔敬主义与政治 / 115
- 三、开明君主 / 117
- 四、哲学家国王 / 122
- 五、西里西亚战争 / 124
- 六、现代型国家 / 128
- 七、真正的音乐家 / 129

第三编 启蒙运动反对革命 德意志新时代

第六章 特洛伊木马: 从法国革命到德意志革命 / 134

一、启蒙运动的冲突模式 / 135

- 二、法国病症 / 140
- 三、德国崛起 / 149
- 四、迈向 1848 年革命 / 154
- 五、1848--1849 年革命 / 158

第七章 绝对之精神和绝对之人民: 19 世纪德国 知识分子的洪流 / 175

- 一、从康德到尼采。/ 176
- 二、纯洁的民族 / 190
- 三、抉择 / 195

第八章 革命的保守主义: 俾斯麦时代 / 201

- 一、宗教和政治 / 202
- 二、首相和宰相 / 206
- 三、震撼欧洲 / 210
- 四、天主教会的防卫 / 213
- 五、真相 / 217

第四编 现代德国

第九章 最后的帝国:从威廉二世时期到魏玛德国 / 226

- 一、倒退与过渡 / 226
- 二、卷入世界大战 / 233
 - 三、战争的代价 / 239
 - 四、魏玛共和国 / 242

第十章 野蛮君王: 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衰 / 255

- 一、希特勒 / 256
- 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 259
- 三、国家的复兴 / 267
- 四、巅峰时刻的纳粹 / 272

五、邪恶的根源:犹太人、基督徒和布尔什维克分子 / 277 六、为什么是希特勒? / 285

第十一章 复合的德国人: 二战后的德国 / 290

一、奇迹和挫折 / 294

二、1990年德国统一 / 303

索引 / 328

译后记 / 361

第一编

从早期部落到第一帝国

第一章 错综复杂的蛮族: 古代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关系

17 公元前1世纪中期,日耳曼诸部落在莱茵河东岸站稳了脚跟。这时,"日耳曼人"(Germani, Germania)这个词开始为罗马人所使用。①当时,日耳曼诸部落不是单一种族构成的,也不是跨区域的联合,而仅是"松散和变化着的民众结合体",他们构成了没有核心的日耳曼人疆域。根据与罗马人的协议,他们以士兵、农夫以及土地与治安税的收税员身份为罗马人服务。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很快在罗马帝国境内或边界上定居下来。②在这些部落中,法兰克人、哥特人和伦巴第人与最重要的首领或王室、家族结成联盟,并信奉他们的家系

① 但是,这一词汇不是"日耳曼人"自己的发明。"当被问及自身的归属时,很多日耳曼部落都会回答自身属于'伦巴第人'、'汪达尔人'、'弗里西人'或者'哥特人',而不是'日耳曼尼亚人'。" Malcolm Todd, The Early Germans (Oxford, 1992), pp. 9—10. On documenting German tribes between the Rhine and Loire, Todd, "The Germanic Peoples,"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3: The Late Empire, A. D. 337—425, ed. Averil Cameron et al. (Cambridge, 1998), pp. 464—471. A brief, up-to date overview is Clifford R. Backman's "Early Germanic Society," in his The Worlds of Medieval Europe (Oxford, 2003), pp. 48—68。

② Lester K. Little and Barbara H. Rosenwein, "The Fate of Rome's Western Provinces," in Lester K. Little & Barbara H. Rosenwein, eds., Debating the Middle Ages: Issues and Readings (Oxford, 1998), pp. 8—10; Walter Goffart, "The Barbarians in Late Antiquity and How They Were Accommodated in the West", in ibid., pp. 26, 38, 40.

神话,由此发展形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认同。①

在数百年里,非日耳曼部落在罗马帝国内也有类似的蛮族经历,这有助于人们对日耳曼人的了解。多民族的日耳曼和非日耳曼部落一开始就显示了适应和结合古代罗马和拜占廷世界的能力。大约在这些蛮族出现5个世纪后,罗马化和基督教化的日耳曼部落将创立一个新的中欧帝国和一种新的文化,并在古罗马的废墟上茁壮成长。在5世纪末6世纪初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人克洛维统治时期与10世纪初萨克森人康拉德统治时期之间,日耳曼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罗马基督教文化和拜占廷文化相融合,创立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西欧。

一、罗马化的日耳曼人

事情开始于公元前 113 年。这一年,在对寻找食物和土地感到失望的情况下,日耳曼部落的辛布里人穿过了位于今天奥地利诺里肯地区的罗马边界,第一次遭遇并打败了一支罗马军队。4 年后,即前 109 年,这个日耳曼部落与另一个日耳曼部落条顿人一道,出现在高卢南部,击溃了一支企图驱逐他们的强大的罗马军队。前 105 年,这些日耳曼部落以更多的人数再次回来。这次,他们击败了两支执政官率领的罗马军队,这是古代罗马最巨大的损失之一。通过这一事件,罗马人注意了觊觎边境的蛮族威胁,派出一支新的强大军队来打击他们。②

① 匈奴人、阿拉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族群的认同观念要淡漠一些。Patrick J. Geary, "Barbarians and Ethnicity", in Glen W. Bowersock et al., eds. Interpreting Late Antiquity: Essays on the Postclassical World (Cambridge, Mass, 2001), pp. 108—109. "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甚至匈奴人都不是罗马帝国的敌人,他们都是(起初是外部的)帝国的一员和帝国的同盟。他们对罗马帝国的袭击与其说是对帝国的人侵,还不如说是对帝国发展的推动。" Walter Pohl, "Conceptions of Ethnicity in Early Medieval Studies", in Little and Rosenwein, eds, Debating the Middle Ages, P. 18. See also Susan Reynolds, "Our Forefathers? Tribes, Peoples, and Nation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Age of Migration", in Alexander C. Murray, ed., After Rome's Fall; Narrators and Sources of Early Medieval History: Essays Presented to Walter Goffart (Toronto, 1998), pp. 17—36, esp. 26。Also relevant are the comments of James J. Sheehan, "What Is German History?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the 'Nation' in Germ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3 (1981); p. 4。

² Todd, Early Germans , pp. 47-49.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7 1 1 1 2 2 2 1 1 1 1

当蛮族迁移重新开始时,日耳曼部落的早期观察者之一是高卢的征服者尤里乌斯·恺撒。根据他的描述,日耳曼部落的管理是非正式的和不一贯的,他们的社会是公社和平均主义的,军事技能方面显得杂乱无章和"卑鄙无耻"。说他们"卑鄙无耻",是根据他们在战场上的"布置"能力(也就是奇袭和伏击)所得出的。部落由"头人"(西日耳曼人方言为"kuning",意为"家族首领")来统治,罗马人对之称呼不一,分别叫做 principes、duces 和 reges。头人由部落贵族和平民战士会议(部落主人)挑选,只有那些拥有王家血统、对家族有贡献并且特别英勇的最杰出的男人,才可能拥有这一高位。①

1. 巧妙应对和反叛

在旧千年的最后数十年和新基督教时代的最初年代,罗马人通过残酷惩罚部落的劫掠和寻找分化与同化他们的方法,消除了日耳曼各部落造成的威胁。②在后者之中,简单的方法就是普通人难以抵制的诱惑。在罗马边界每侧30英里内,罗马人与日耳曼人有规律地相互混杂。③当日耳曼人用牛和奴隶(这些都是在与外部部落战斗中获得的战利品)交换罗马的青铜器、玻璃器皿和毛皮时,罗马的语言文化和政治就随着贸易车的车轮来到了部落里。在与罗马人接触前,部落头人更多的是通过说服而非专制来统治,通过平均分配土地和财富来维持部落内的和平。与罗马人的贸易中得到的新财富使部落社会开始分化,产生了新的富人与穷人的对立,鼓励了分配不均的部落土地分割。罗马的独裁统治和元老院生活方式也给日后的部落首领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罗马接受了教育。

罗马人另一个分化策略是鼓动部落间的冲突,而部落则很容易上

① Geary, "Barbarians and Ethnicity", p. 112; E. A. Thompson, The Early Germans (Oxford, 1965), pp. 1-16, 29-41.

② "与罗马军队跨过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远征暴行相比,这些野蛮人袭击罗马帝国所造成的破坏却显得苍白而逊色。" Geary, "Barbarians and Ethnicity", p. 114。

③ See the frontier studies of C. R. Whittaker, 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Baltimore, 1994) and Benjamin H. Isaac, The Limits of Empire: The Roman Army in the East (Oxford, 1990).

当。在他们的敌人的眼里,这些蛮族人的强大力量恰恰也是他们的巨大弱点。塔西佗有些夸张地描绘说,他们垂涎于战斗,"不愿通过流汗而慢慢地积累……那些通过些许流血就能很快地得到的东西。"① 在罗马人干预之前,武士精神使得部落间相互敌对,使他们的敌人对部落间的不团结有机可乘。时间一长,对于派系首领而非正当选举出来的首领的效忠,以及对于得到部落财富的群体的安排,使得在部落内出现了自由散漫的亲兵侍从。他们是通过袭击临近部落夺取牛、奴隶和其他产生财富的战利品而获得特权地位的关系密切的集团。他们的受害者会整体向该部落复仇,而外来入侵则增加了由于亲兵侍从带来的内部分裂。这些蛮族人内部的混乱和暴政也给罗马人在各部落内部找到了立足点,允许这些部落不用遵守有关部落首领和战士会议的保护性规定。②

最后,罗马人将头人们的儿子迁移到罗马,让他们享受物质上的好处,使他们像罗马人那样成长,以此来使各部落按照罗马方式运行。这种移居是通过邀请和上交人质的方式进行的,被选择的蛮族精英通过这种方式罗马化了,许多人的余生在罗马度过,其他人则作为被同化了的罗马帝国的仆人返回故土。③说这些被遣返的部落精英为受到洗脑者有些过分,实际上,通常情况下,他们乐意为罗马帝国服务,因为这样自己可以得到更多的土地和财富,还可以继续在国际性的罗马世界享有公民权。在那些亲罗马的首领们打败了其部落敌人的地方,他们也向罗马提供帮助,减少了蛮族世界对罗马人的威胁。④这些策略和措施的结果是:公元4世纪前,大多数生活在罗马边界内和边界上的日耳曼与非日耳曼蛮族都选择了服从而非挑战。

Tacitus, The Agricola and the Germania, trans. H. Mattingly and S. A. Handford (London, 1970), pp. 113—114.

² Thompson, Early Germans, pp. 48, 53-60; Todd, Early Germans, pp. 32-33.

³ Thompson, The Early Germans, pp. 18, 21—24, 28, 73—74, 79, 92—95; Todd, Early Germans, pp. 88, 90, 95, 100.

⁴ Geary, "Barbarians and Ethnicity", p. 110.

2. 谢鲁斯克人

考察谢鲁斯克人 4 代首领的历史表明,罗马人在促使蛮族自相残杀方面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公元 4—6 年,该部落 25 岁左右的军事酋长阿尔米纽斯指挥着罗马帝国军队的日耳曼分队,并因此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罗马公民权。公元 9 年,他率领战士反击罗马日耳曼尼亚总督帕布利乌斯·昆克蒂利乌斯·瓦鲁斯指挥的 3 个罗马军团。此次战役使用了诱导和伏击战术,后来被称为 Blitzkrieg^①。阿尔米纽斯的军团在托依托堡森林赢得了让人无法忘怀的胜利,结束了罗马人把帝国扩张到莱茵河以东地区的计划。^②(今天的德国人仍经常瞻仰 19 世纪竖在戴特莫尔德的阿尔米纽斯纪念碑。)在 15 世纪后期的印刷术时代,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和民族人士发现和出版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宣称阿尔米纽斯是日耳曼人的"解放者",他的胜利标志着德意志历史的开端。③

为何罗马方面在阿尔米纽斯身上的投资没有得到回报?在他反叛时,谢鲁斯克人对罗马的税收和司法感到痛心,许多人与阿尔米纽一样,他们看到自己的未来只是寄人篱下。阿尔米纽斯家族的三代人在效忠部落还是效忠罗马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但从未反叛。阿尔米纽斯的岳父西吉斯特长期为罗马人服务,当他得悉了阿尔米纽斯的计划后恼羞成怒,竟在攻击的前夜将反叛的消息泄漏给罗马人。阿尔米纽斯的兄长弗拉维乌斯同样效忠罗马。公元15年,罗马派出日耳曼尼库斯的强大军队去惩罚谢鲁斯克人,弗拉维乌斯和他的同盟军队则予以配合。出生于罗马并在罗马得到栽培的弗拉维乌斯之子、谢鲁斯克人首

① 德语,意为闪电战。---译者注

② 位于现在的比勒费尔德和北部莱茵一威斯特伐利亚的奥斯纳布鲁克之间。

③ 在塔西佗的新版作品全集(罗马, 1515年)出现之前,他的著作在 1451 年就曾被发现, 1470 年在威尼斯和 1473 年在纽伦堡 1473 年印刷出版。1458 年意大利人对《日耳曼尼亚志》一书进行评注,1526 年该书被翻译成德语,增加了德国人对该书的兴趣。Todd, Early Germans, pp. 52, 256; Gerald Strauss, ed., Manifestations of Discontent in Germany on the Eve of the Reformation (Bloomington, Ind., 1971), pp. 75—81. On the waning of the myth, see, Facts, p. 90。